

如何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 杨金卫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牢牢站稳政治立场；要补足理想信念“精神之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要切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内监督。

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正是为了使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四个意识”中，政治意识是打头的、管总的，是根本，确保方向和立场正确坚定；大局意识是基础，确保局部和整体协调一致；核心意识是关键，确保全党的集中统一；看齐意识是保证，确保队伍的整齐有力。只有讲政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自觉从政治高度看问题、办事情，才能真正做到服从大局、围绕核心、自觉看齐。

当然，讲政治不是老调重弹，更不是“文革”中搞的极左政治，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基于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需要把握新时期讲政治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衡量讲政治的根本标准是看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政治上的问题，必须从政治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治本之策。讲政治，就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讲政治，就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讲政治，就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能力；讲政治，就要求

领导干部严格自律，担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牢牢把握这些要求，善于从政治上把大局、看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我们才能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行百里者半九十。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讲政治关乎党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证。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离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仅有咫尺之遥。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都迫切需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敢于迎接挑战，善于把握机遇，使党成为更加团结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讲政治的目的在于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力量，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而奋斗。作为党员干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防止和克服忽视政治、淡化政治、削弱政治的倾向。

首先，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牢牢站稳政治立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相比，其先进性的突出表现就是最讲政治，最懂政治，善于运用政治规律在领导人民实现、维护和发展利益的过程中，赢得人民群

众的认同和拥护。我们党讲的政治，是有着崇高理想、远大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治，是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政治，是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的政治。作为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绷紧政治这根弦，增强政治意识，坚持党性原则，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形势越是复杂，现象越是纷繁，就越要讲政治，时刻把党摆在心头正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如此，才能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始终牢记为什么出发和走过的过去，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其次，补足理想信念“精神之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原则和规矩，必须坚持思想引领，在固本培元、凝魂聚气上下功夫。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而以信仰的力量凝聚意志力量、统一思想行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员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最后，切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内监督。历史与现实一再警示我们：人无规矩则废，党无规矩则乱。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严峻，政治的弦越要绷得紧一些、再紧一些。讲政治不能只是纸上谈兵、空喊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落实到党员干部的具体行动上，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事业发展。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内监督，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和实践性，着力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讲政治，就必须以铁的纪律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以严的规矩要求党员干部遵纪守法、为民务实、干事创业谋发展，团结带领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建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两横一竖”看干部

□ 凌焕新

“干”字，两横一竖，喻示一根扁担、一根秤杆、一根标杆。读懂了“两横一竖”，也就掌握了当领导、做干部的核心要义。

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极富智慧。许多字，不仅形甚美，而且意很深。如今书店里所谓的“官场”“宝典”汗牛充栋，许多都可归于“有价格、没价值”之列。其实，只须用心琢磨好干部的“干”字，把“两横一竖”读懂了、吃透了，也就掌握了当领导、做干部的核心要义。

仔细观之，“干”字的“两横一竖”，多么像“一根扁担”、“一根秤杆”，再加上“一根标杆”！

“扁担”，意味着担当。干部的职责就像桥，桥的价值在承担。当领导做干部就要挑担任事、守土尽责。社会上有“无官一身轻”、“天塌下来高个儿顶”的说法，虽有些“事不关己”的消极，但也不乏“在其位谋其政”的道理。既然上了“官场”，做了“高个”，就不可以“一身轻”，就要能顶“一片天”。有的同志相信“好马出在腿上，好官出在嘴上”，占着扁担不挑担，号子喊得不可谓不响，实际上是“扁担摆肩上，装作挑担样”，甚而下“扁担”竖在右边做靠背，或者搁在屁股下面当坐垫。挑夫最能走稳走快。以扁担做享受，弄不好就会“人仰马翻”。还有，担要挑两头——一头挑物质，一头挑精神；一头挑发展，一头挑安全；一头挑机关，一头挑基层……顾这头失那头，重这头轻那头，“一横”就会变成“一撇”，“一撇”就会变成“一捺”，即便还可以看得出是“干”，也会因七歪八倒，而显得十分难看。

“秤杆”，意味着公正。当领导、做干部是“替众人做事”、“做众人之事”，属于“用民之权、为民服务”，处理问题尤需坚持公事公办，确保公平公正。“水平不流，人平不语”，群众信得过，你才能走得稳。有的同志“秤杆”意识差，法治观念淡，把“公家”当成“自家”来管，把“班长”当作“家长”来当，“想用谁就用谁”、“想给谁就给谁”、“想欺谁就欺谁”；有的对老部下、老同学等“面熟的”关照三分，对喜欢“跑”、喜欢“拍”等“嘴甜的”青睐三分，对动不动就要“告”、就要“闹”等“性急的”迁就三分。如此这般，自然不可能当好领导、做好干部。谁都会有亲近近邻、有好恶喜厌，但党员干部讲的是“立党为公”，搞的是“五湖四海”，不能感情用事，不允许公私用。如果搞亲疏有别，让“圈子”盛行，利益分配“与能力无关，与背景有关”，“与规则无关，与勾兑有关”，这样必然坏了风气、散了人心，最终既害了单位、也毁了干部。

“标杆”，意味着示范。“治人者必先自治，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须先成。”那句“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的老话，到啥时都不会是“过去时”。有“带头”就会有“带动”。当领导、做干部，台上讲的时候要“说得好”，台下做的时候要“干得好”。官员的“不言之教”，是无声的命令、无声的指示，会令人信服、让人折服。虽然“十全十美是上帝的尺度”，但追求十全十美应当是为官从政的尺度。当领导、做干部，标准要求不能高于普通群众，甚至“当群众的尾巴”，就是应当在各方面对自己更苛刻一点，追求更高一些、做得更好一点。这是基本的为官之德，也是重要的领导方法。

再看“干”字的框架结构，同样耐人寻味。简单三笔，干净利落——这是说，作风上不能拖沓拖沓，必须说干就干，紧抓快干。没有点撇捺，没有弯勾折——这表明，不能投机取巧，八面玲珑，必须老实本分、真抓实干。转过来看“干”，就是战士的“士”——这告诉我们，“干”本质上就是“士”，不同之处只在于应当比“士”站得更高、干得更快。

干部姓“干”，思想觉悟、精神作风体现于“干”，能力素质、实绩进步来自并见于“干”。当一个好领导，做一个好干部，就必须恭恭敬敬地写好“两横一竖”。只有把每一笔都写得用心、很用力，写得很有劲、很有力，写得很到位、很饱满，才能“写”出当领导、做干部的动人神采与无限精彩来。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 檬



少年、醒狮与新芽

□ 俞祖华

或者类似隐喻，在清季即已得到广泛传播。杨度于1903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了《湖南少年歌》，呼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1908年出版的理想小说《新纪元》，描绘了1999年的中国，称“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1912年民国成立，使青年一代似乎看到了社会万象更新、国家刷新振作的希望，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青春中华”、“少年中国”之梦以挟山移海之势澎湃而来。李大钊频频使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青春中华”、“中华再生”等说法，表达其民族复兴思想，成为中共党史上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五四时期怀着“青春中华”、“少年中国”之梦的青年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从清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民国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之梦，有一些共同的思想特质，如：他们都把国家民族看成类似人体一样的生命，有少年时期、青春时期、衰落时期等不同阶段，且认识到民族作为群体，不同于个体，个体生命有其死生灭亡，群体生命则确实可以“再生”“复活”；他们都不认同中华民族是不可救药的“老大帝国”，都相信古老的中华文明能够得重生、新生；他们都认为创造“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主要责任在中国少年、中国青年，称“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先哲们还以“睡狮猛醒”、“凤凰涅槃”等动物意象，比喻中华民族的重新提振、文明古国的涅槃重生。近代先驱者在选择以动物比喻中国时，既非常反感西人、日本人将中国人称作猪，也非常不愿意使用被清王朝视为帝制、天朝象征物的龙，他们“宁要睡狮不要飞龙”。在近代中国，“睡狮”是最足以激发国人之强国梦的中国符号，人们希冀中国如万兽之王雄狮觉醒后王者归来。国人广泛使用“东方巨龙”、“巨龙腾飞”来比喻中华民族的崛起，是帝制终结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

“睡狮猛醒”、“凤凰涅槃”动物意象，象征着中国遇到重挫后的重新发力，隐喻着中国发展动力的重新启动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提振与综合国力提升。犹如动物在惊蛰之后的

苏醒，中华民族再次充满生机与活力。据现有材料，国人最早谈及从昏睡中唤醒之意的当出自曾纪泽，他出使英俄期间于1886年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论文《中国先睡后醒论》。该文针对“欧洲人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指出“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曾纪泽谈到“中国先睡后醒”，但并未提到“睡狮”。以“睡狮”比喻当时中国的，梁启超是较早的一位。他于1898年4月在保国会演讲中，提到了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1899年，梁启超发表《自由书·动物谈》一文，再提此事，并把“睡狮”说的发明权，归之于并未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使用过“睡狮”一词的曾纪泽。有一类说法，以“睡狮”、“醒狮”比中国之说，源于西人，尤其是来源于拿破仑，不足为证。

到20世纪初年，“睡狮”、“醒狮”之说开始广为流行。如1903年，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中有“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之语。是年，高燮发表了一首《醒狮歌》。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连载陈天华遗著《狮子吼》，其中第二回题为“大中华沉沦异种 外风潮激醒睡狮”。秋瑾《读警钟有感》中称“此钟何为铸？铸以警睡狮。狮魂快归来，来今分今莫再迟”。从清末到民国，还出现了数种以“醒狮”为名的刊物。

纵观近代史上的以“睡狮”、“醒狮”比喻中国之说，其要义大致有：中国、中华民族暂时沉沦了，但绝非“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不可谓为将灭之国”，而是“似人酣睡，固非垂毙”的“睡狮”，仍有元气，仍有生机，仍有活力，有希望重新振作，“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中华民族可以唤醒，但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近代中国先驱者为唤醒中国而焦灼，而疾呼，而奔走，但西方人并不希望“睡狮”被惊醒为“醒狮”，还不断抛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一类言论。我们一方面对内要提振自信，并要有足够的清醒，绝不因被恭维为“睡狮”而飘飘然；另一方面要对外展现文明大国的气象，尽量不给“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以口实。

先哲还以凤凰涅槃为喻，描述从酣睡，沉沦的中国走向苏醒、振兴的过程。在近代，凤凰涅槃之喻影响最大的当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诗。该诗以凤凰传说为素材，以凤凰在烈火中焚毁而获得重生比喻民族复兴。自此，以凤凰涅槃隐喻民族复兴，以凤凰涅槃比喻中华民族的浴火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无论是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讲政治始终是一以贯之的要求，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点和优势。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改革开放新的时期，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要注重从政治上加强自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讲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党必须讲政治，党员、干部要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从提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到要求党员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从增强政治定力，到强调“心中有党”；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到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讲政治，一再强调政治问题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政治上的要求要始终摆在首要位置，讲政治、增强政治意识是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党内有些同志片面甚至错误地认为政治不那么重要了，有的党员、干部甚至由政治上模糊变成政治上糊涂，自觉不自觉地犯政治错误。有的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不同程度滋生蔓延。面对新的时代环境和执政挑战，面对“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决胜全面小康，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党中央要求广大

近代历史上形成的少年中国、睡狮猛醒、老根新芽等文化意象，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最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时刻。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我们伟大民族还在经历着的劫而不覆、衰而复振的艰苦历程，近代哲人们曾以一些文化意象，如人生意象“少年中国”、“青春中国”，动物意象“东方睡狮”、“凤凰涅槃”，植物意象“老树新芽”等，比喻古老中国的“旧邦新命”、中华民族的涅槃重生，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仍具有借鉴意义。

“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人生意象，隐喻着政治层面的变革：“老大帝国”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历代王朝，取而代之的“少年中国”、“青春中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是人民共和国；一脉相承的是“旧邦”的社稷江山、祖宗基业，改弦更新的是制度重建、“直接民权”以至人民当家做主；“帝国”的臣民、奴隶，通过改造国民性而成为“新民”、“新人”，成为现代国家国民、现代社会公民。中华民族通过彻底的政治变革，实现了现代国家重建，为中华民族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

“少年中国”梦想可追溯到进入近代前夕的龚自珍，他写成了《少年揽辔澄清意》、《能令公少年行》等诗，表达了“更法”、“改图”、再图振作、澄清天下的理想。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提到：“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梁启超于1900年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正式推出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发展历程中第一个以中华民族衰而复振为意境，旨在鼓舞民族自信、激励国人奋发的文化意象。该文称：“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以人事代谢言说国之盛衰、民族之盛衰。他对当时处衰落之势的中国，被日本人、欧西人称为“老大帝国”，深以为憾、为耻。认为清王朝“颓然老矣”，然而国家仍有前途；深信中国虽为文明古国，但从现代国家的标准而论，还是“少年国”，拥有未来，拥有希望。

“少年中国”之梦提出后，这一文化意象